

灵韵,物与人的生命史交织

张 晓 翔

记得2004年暑假,我有幸赴台湾清华大学跟随人类学家陈祥水教授做短期的学习和研究。在那段密集知识输入的时光里,我辗转多地不停参访、调研,还参与田野调查,获得感满满。20年之后生活和工作兜兜转转,虽未再从事人类学相关的工作,但在此时遇上《77街的神龛——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灵韵与人的故事》这本书,被作者讲述故事的天赋和对人类学博物馆的敏锐观察与思考所折服,勾起美好往事的同时,也不免引出一丝思考。

何为“灵韵”:物的生命史与人的故事

坐落于纽约上西区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由多座博物馆构成的博物馆群,它们以天文、矿物、古生物标本收藏闻名于世,大家所熟知的系列电影“博物馆奇妙夜”正是取景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因而这里的恐龙化石和动物标本似乎更受人瞩目。其靠近纽约77街的人类学展厅展示着北京的皮影、西藏的唐卡,甚至还有占据一面墙的阿兹特克太阳石——正是书中的这座“77街的神龛”。事实上,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本书选择用一件藏品或展品引出一个有关人类学博物馆主题的叙事方法,思考深刻又表达生动。

书名副标题中的“灵韵”一词,本意指艺术作品的一种独特的、超凡脱俗的气质。它是一种笼罩在艺术作品之上的神秘氛围,使作品具有一种令人敬畏、吸引人的精神品质。观众在欣赏有灵韵的作品时,会产生一种敬畏和惊叹的情感,仿佛作品有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力量。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其美学理论中提出了“灵韵”的重要概念。他用“灵韵”来描述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区别。传统艺术作品具有灵韵,例如古典绘画、古老的雕塑等,它们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下产生,灵韵与作品的独一无二性、不可接近性有关。传统艺术的灵韵是在仪式和崇拜中产生的,作品在被观赏时有一种神圣的距离感。

从这层概念出发,本书作者提出了一道思考题,也是我们展览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博物馆里的佛像、面具和神衣等具有一定的“灵韵”,它们既不像其他展厅中的标本化石,也不完全等同于佛寺庙宇中被人供奉的神圣之物,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博物馆会是它们的终点吗?《77街的神龛》给出了答案——物的灵韵,离不开人的故事。现代人类学的收藏与展览不是为了留下某种文化的“最后一刻”并将其封存在展柜里,而是用一件器物去讲述人的生命史与物的生命史相互交织的故事。在“一张唐卡的旅程”这一章,作者用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还原了唐卡如何出自一位中国青海省热贡县的女画师之手,“为《冥想观音》起稿时,可能是借自己心里最不平静的时期。她的新角色——妻子、儿媳、一岁婴儿的母亲,以及她一直承担的家中‘大女儿’的责任,让她很难找到时间坐到画布前。但凭借当年决定成为唐卡画师的坚定,她借用了这张《冥想观音》向其他人证明,女性画师,哪怕是刚刚生了孩子的女性画师,



《77街的神龛——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灵韵与人的故事》薛 茗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出版

也可以和男性画师一样创造出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字里行间是女性的热爱与坚守,也让人感动于博物馆里人类学家工作的意义。由此想到笔者工作的公共图书馆专业展厅里,曾经也多次举办过唐卡艺术展。过往的呈现模式多聚焦于作品艺术表现的雕琢,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唐卡艺术的视觉魅力,然其背后所潜藏的丰富人文宝藏——或是创作者的匠心独运,或是收藏者的珍视传承,又或是策划者的精心布局,却被不经意地遮蔽于艺术的华彩之后,未能充分彰显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诚然,不同的展览语境与目标定位会催生出各自的策展路径,但当我们深入反思,会发现过于注重展品的直观呈现,而忽略了其背后所凝聚的人类情感、历史脉络与文化交融的深刻内涵,何尝不是展览的一种缺失。

如何阐释:“在场性”抑或“在对岸”

在博物馆的世界里,阐释犹如一把双刃剑,其重要性在“博物馆化”的进程中愈发凸显。博物馆化起始于对物的收藏,当物品脱离原生地、文化与经济背景,被选择、收集并移植到博物馆时,其语境被剥离,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并重新构建。物的价值在时代浪潮中日益多元,而价值赋予的手段也因时代更迭而被赋予不同解读。这一过程使得阐释成为连接展品与观众的关键桥梁,没有恰当的阐释,观众难以理解展品背后的深邃内涵。

在“空中行船”一文中,人类学家米德不愿循规蹈矩,她的野心是“让纽约的观众既对太平洋原住民的多样性有一个整体了解,又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对新型建材的大胆使用不但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艺术馆里反而成功的极筒设计在人类学展厅里反而弄巧成拙。无论是模仿海水而铺的绿松石蓝色地板,还是为了模拟热带阳光而悬挂的千余盏日光灯,都没有赢得观众的芳心,大家普遍认为这些材料和太平洋岛屿的本土环境差异过大,观众根本不可能“沉浸”到当地的生活氛围中,仅六年,展馆便关闭重修。太平洋展厅所面临的将人类学知识“翻译”成公共展览的困境,涉及到“在场性”与“在对岸”两种阐释风格的探讨。米德的“在场性”,源于她细致



▲正在绘制唐卡的热贡女画师伦措(本书作者摄于2018年)

入微的观察与不懈的书写,她以“从我坐着的地方讲起”的方式,试图引领读者走进她的田野,感受真实的情境。然而,与之相对的学院派人类学写作则站在“对岸”,以一种上帝视角进行概括、抽提、归纳与演绎,作者隐匿自身痕迹,以维护学术作品的理性与权威。这种差异导致米德的作品虽受普通读者喜爱,却在学术界饱受孤立。

进一步来看,米德将“在场性”转化为“沉浸式”展览体验的尝试利弊共存。从积极方面而言,她希望观众能像她一样“到场”,亲身体验太平洋海岛的文化与自然环境。但现实却存在诸多阻碍,对于米德来说是真切回忆的场景,观众只能凭借想象去构建,而展厅的种种元素,如灯光颜色、展柜材质、展品样貌等,可能会限制观众的想象空间,与观众自发代入的意境大相径庭。就如同经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难以尽如人意一样,展厅设计中也不存在着矛盾动机,既期望观众“身临其境”深入特定文化内部,又希望观众能从宏观上把握展厅全貌。米德的女儿也指出,尽管展厅背后逻辑美好,但现实中奇材料难以整合为统一叙事。作者也提出了我们在策展时经常会灵魂拷问的问题:即使借助先进技术打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效与沉浸式体验,如LED射灯、360度投影仪、VR技术等,这是否真的能让观众更深入地理解展品、艺术家或一种文化?会不会只是陷入感官愉悦的“马戏团”陷阱,而智识却毫无增进?

如何定位:以物为中心还是以人为中心

如果说米德关注的是展览阐释手段的问题,其出发点还是希望观众能感受与理解,那么在“无字真经”一节中,博物馆经理邦普斯与人类学家博厄斯对于一张小小的展览标签的争论,却导出另一个更令人深思的议题:博物馆究竟该以何种导向为根本?

1904年,劳弗作为“取经人”,为西方世界带来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学收藏——农人群劳作时的草鞋、街头巷尾的麻将、象棋,甚至是斗蛐蛐的罐子……这些中国民族学“真经”聚集一起,自此自然历史博物馆三层的“中国馆”拉开帷幕。然而如果让现在

的展览设计总监穿越去参观,恐怕他会气到撞墙——没有任何策展技巧和技术手段,如此密集而细致地展示中国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好比塞给观众一篇又一篇期刊论文。邦普斯终于爆发了,他向馆长建议,科研和策展应该分别由不同的人来负责。但博厄斯极力反对,最终给出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解决方案,即在每次展览的时候分开两个馆——一个馆面向没什么知识储备的大众,另一个馆给有这方面专长或兴趣的观众。这个建议当然被驳回,且不说没有空间来“区别对待”,恐怕到时还要面临被观众投诉的境地。

故事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博物馆的定位问题,博厄斯眼中的博物馆收藏并非为了博眼球的展览,而是服务于深入的科学研究。这种理念下,展览标签被忽视。然而,邦普斯认为若博物馆展览内容与标签艰深晦涩,难以被大众理解,那便违背了其公共职能。这两种观点的对峙,反映出博物馆定位在学术研究与社会教育之间的摇摆不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博物馆已坚定地踏上了“以观众为中心”的道路。展览标签的撰写成为了一项专业艺术,专业的策展专家与团队精心雕琢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他们深知标签不仅要传达展品的基本信息,更要以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展品背后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展现给观众。“美国博物馆联盟展览说明牌写作卓越奖”的设立,便是对这一理念的有力推动与肯定。这些优秀的展览标签,有的通过巧妙的故事讲述,有的运用富有创意的互动式表述,成功地吸引观众深入了解展品,使观众在展览过程中不再只是走马观花,而是能够真正领略到文化与知识的魅力,在心灵深处与展品产生共鸣,进而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承与传播。

在博物馆与图书馆展览的漫漫征途中,我们对“灵韵”的感悟、阐释方式的权衡以及定位方向的抉择,都将持续影响着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无论是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还是展览从业者的实践摸索,都在为构建更优质、更具内涵的展览体验添砖加瓦。我们需怀揣着对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这一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领域中不断前行,使每一次展览都能成为开启观众心灵之门的钥匙,让文化的光辉在岁月长河中永不黯淡。

未来,从改变“细胞”开始

齐 允

瘤医生的身份让本书有了大量生动的临床案例;书中众多前沿科技和前沿科学家的手,则得益于他的学者身份;最后他用成熟作家的流畅文笔,将几百年人类走过的求索之路,描绘得激动人心。

这个精彩的故事始于1837年,两位好朋友共进晚餐。他们是植物学家马蒂亚斯·施莱登和动物学家特奥多尔·施旺。聊到兴起,施莱登说他发现植物中每个部分都由独立自主的细胞拼装而成;施旺则在动物中似乎也如此,施旺便拉着施莱登去看他做的动物标本。这一看,酝酿出了变革整个生物学的真理——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元。从那时起,这个概念席卷了生物学与医学,几乎触及这两门学科的所有方面,并且永远改变了它们。微小、独立、自我调节的细胞,组成了复杂精妙的人体。细胞的繁殖、生长、新陈代谢,使人体拥有基本的生命特征。我们由细胞单元构成,反过来,我们的短板,也取决于细胞的弱点。因此设计和操控细胞,成为新型医学的基础,而如今我们已经初具操控细胞的能力。

当视角深入细胞,对于许多病症的根源都可以被重新理解,新的“解题思路”也随之而来。例如I型糖尿病,是患者的免疫细胞攻击胰腺的β-胰岛细胞,现在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检测血糖并注射合适剂量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来改善症状。但细胞疗法有可能真正“治愈”I型糖尿病——诱导人类干细胞样

细胞形成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2014年,哈佛大学道格拉斯·梅尔顿教授带领的团队成功做出了由于细胞制备的胰岛素细胞,现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与常人无异,不再需要一天几次测量血糖、注射胰岛素或是带着蜂鸣检测器的“新型糖尿病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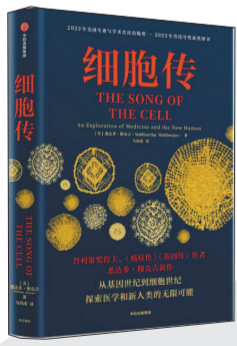
又如骨关节炎是一种会困扰大多数老年人的疾病。这种软骨退化的疾病,一般无法治愈,只能用各种手段缓解症状。传统观念认为,骨骼之间持续的摩擦会侵蚀骨端(例如股骨)的软骨滑膜层,关节表面的软骨细胞相继死亡,然后关节下面的骨头开始磨损。但悉达多·穆克吉及其合作者通过一系列实验,于2021年提出了一项关于骨关节炎的全新假说。他们认为,骨关节炎不仅是源自摩擦与撕裂导致的软骨细胞退化。它首先是一种由Gremlin标记的软骨细胞死亡所引发的失衡,这些细胞无法生成足够的骨骼与软骨来满足关节的需求。因此,一则古老的谜题得到了解释:为什么成年人的关节软骨无法像骨折一样得到修复?因为修复细胞在损伤时会死亡。

损伤与修复拥有共同的边界,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损伤与再生能力的减弱不断加剧,逐渐超过了这道障碍。骨关节炎是一种源于再生障碍的退行性疾病。它是一种再生稳态的缺陷。既然从细胞上找到了此病的根源,那治疗它的思路也随之而来:在修复细

胞被损耗殆尽的关节中,植入软骨干细胞。这种导致成千上万人致残的疾病,因细胞的衰退而产生,或许也能因新细胞的到来而消失。

最后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则是一类抗拒衰退的细胞:癌细胞。在手术切除、化疗、放疗等从外部攻击癌细胞的手段之外,细胞疗法是一种全新的思路:既然免疫系统分不清癌细胞与正常细胞,就“教会”它识别恶性细胞,从而调动人体自身的免疫去杀灭癌细胞。目前最成功的病例是埃米莉·怀特黑德。她于2012年加入了CAR-T细胞疗法实验。最终怀特黑德的免疫系统通过武装T细胞杀伤癌症得以重建,骨髓与血液中都检测不到癌症,甚至被认为已经痊愈。这无疑是对全人类的巨大鼓舞。

细胞疗法已经延伸到医学的各个领域,未来还会带来什么?让我们期待一下,或许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型人类:“新人类”不是指科幻和英雄电影里拥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类,而是一种通过修饰细胞重新构建的人类。在《细胞传》中我们会遇到“新人类”,我们还会接触到利用细胞逐步创造更先进人类的想法。其中一些想法或许会在遥远的未来实现,但还有一些进展在我们阅读时正在发生。我们正从基因世纪过渡到与之交相辉映的细胞世纪,它势必将在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而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先行感受新时代降临的呼吸。



《细胞传》[美] 悉达多·穆克吉 著 马向涛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出版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的相貌、骨骼、大脑构造都相去甚远,但是如果用显微镜观察我的皮肤或肝脏,你会发现它们惊人相似。你和我,均源自单个细胞,从这个细胞衍生出多个细胞,构成了你我的身体。细胞比你想象的还要意义重大,它彻底改变了生物学、医学以及我们关于人类的观念,它也与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人类追求的更好自我,或许就写在细胞之中。

继《癌症传》和《基因传》两部深受好评之作后,普利策奖得主悉达多·穆克吉这次将视线聚焦在了细胞上,他想要用新作《细胞传》讲述人类与细胞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人类发现细胞的过程,细胞是如何实现复杂的生理机能,以及细胞功能障碍是如何导致疾病的,最终细胞引发了生物学与医学的革命,操控细胞的新疗法可能改变人类。在《细胞传》中,悉达多·穆克吉将他的多重身份进行了巧妙融合:他肿

当梁思成错过了梁思成

读萧易《漫长的调查》

禾 刀

在四川剑阁县与阆中市交界处有个香沉镇,香沉镇上有座始建于元代的香沉寺。在香沉寺山中丁袱上的题记里,赫然写着梁思成、梁思永兄弟二人的名字。

1939年1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开展川康古建筑调查途中,梁思成一行曾到过香沉镇所在的剑阁县,但未到过香沉寺。营造学社于1930年2月在北平正式创立,朱启铃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楨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学社主要从事古代建筑实例的调查、研究和测绘,以及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1938年春,历经两年战乱辗转,中国营造学社在昆明复社。1939年8月27日,营造学社冒着头顶的飞机轰炸,开启了四川、西康古建筑调查活动。本次调查,梁思成一行沿川陕公路北上,调查了广汉、德阳、绵阳、梓潼、剑阁、昭化、广元,再顺嘉陵江而下到阆中、南部、蓬安、渠县、南充、蓬溪、遂宁、大足,由重庆回到昆明龙头村,前后历时173天,走访了巴山蜀水35个县市,调查730多处汉阙、崖墓、摩崖石刻、寺院、祠庙、塔刹等古建筑、古遗址,拍下3100多张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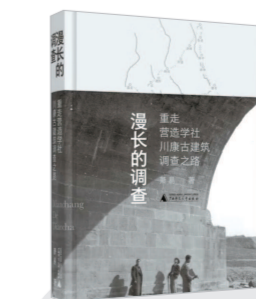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萧易热爱地理寻访,对川蜀大地的古建筑古物件如数家珍。他擅长钩沉历史,文章贯通古今,此前曾出版过《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影子之城》《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等著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十多年前,萧易发现,在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手中还保存着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的照片,欣喜万分,于是决定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试图拼凑出80年前川康古建筑、古遗址旧貌。需要着重说明一点的是,同为营造学社重要成员的刘敦楨有写日记习惯,这让那些生冷的照片变得生动起来。萧易据此在每章节前绘制当年的调查路线草图,依时间线索铺陈叙事,一目了然。

营造学社田野调查的艰难程度在今天很难想象,一方面日军飞机在头顶顶空轰炸,另一方面由于连年兵燹,国穷民困,川康地区虽然不是抗日前线,但交通、生活条件同样差到极点。一路上,考察团成员不得不与灰尘、阴雨、臭虫相伴。在那些照片中,原本意气风发的梁思成,常常“灰头土脸,一脸倦容”。尽管如此,考察团一遇上古建筑古遗址,总是立马精神抖擞,倦意全消。除了旅途与生活的极大不便,调查工作也颇为艰难,各种资料残缺,许多信息的获取只能靠考察团“察言观色”和“道听途说”。限于时间关系,营造学社常常“只能沿着官道、驿道做调查”,如此一来,难免错失许多地方。

萧易的重走,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这次重走,是对故人当年思想的再探索,对那些照片背后隐藏的叙事再挖掘。在寻访剑阁千佛岩后,梁思成记载“大小百余龛”,而在1958年当地文物单位统计石窟数共220龛。上世纪80年代学者考察编号却发现162龛,两相对比,“半个世纪中,千佛岩50余龛造像已经不翼而飞”。经过一番调查,原来是上世纪60年代,当地为建设氮肥厂,就地取材,一批佛像像所当然地成了建筑原材料。那次考察,梁思成始终怀有一个强烈愿望,那就是希望发现宋元建筑遗迹,可最终只能遗憾而归。萧易发现,梁思成并非没有与宋元建筑接触,只是限于资料原因未及考证,未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在考察峨眉飞来寺时,梁思成觉得“隐有古风”,却因缺乏证据,只能谨慎地将其归于明代。萧易补充了自己的调查,飞来寺“1983年维修时,工人在飞来殿前檐角梁上发现了带有‘元大德戊戌年’题记的铁钉。大德是元成宗年号,大德戊戌年为1298年,这个发现也将飞来殿的年代拉回到了元代”。由此可见,营造学社的严谨治学态度令人敬佩。再者,运气并不一定会眷顾那些勤奋和努力的人,同样的失之交臂在后来的考察中仍然时有发生,只是限于信息短缺闭塞,考察团始终并不知情。例如在考察梓潼七曲山文昌帝君祖庭时,梁思成他们根本未曾预料到“公路对面还有座元代盘陀殿”。

萧易重走后发现,“除了飞来寺在峨眉路边,四川已发现的宋元建筑大多地处荒野田畴,且以家庙为主,这才能熬过王朝变迁与岁月流逝。显然,营造学社步履匆匆的考察,并不能覆盖四川广袤的土地”。文头提到的香沉寺因为与考察路线相隔甚远,虽然1939年11月,梁思成、刘敦楨一行确曾到过四川剑阁县,但在近在咫尺的香沉寺依然失之交臂。至于丁袱上题记里的名字,只是历史上的一次有趣巧合。历史就是这么有趣,香沉寺的建设主人们“怎么都不会想到,700多年后,会有个同名的年轻人在蜀地寻找宋元建筑;而梁思成也怎么都不会想到,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梦寐以求的宋元建筑上”。

在一路目睹古建筑的疮痍后,考察团既为这些古物年久失修颇为惋惜,更为一些地方频频拆除古建筑之举极为痛心。在离开广元后,梁思成、刘敦楨“专程去县政府,请求保护千佛岩”。这件事的结果,刘敦楨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可能又与之前的经历一样,“碰了钉子吧”。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年代,一个人的生命尚且难以得到保障,谁还管得了这么多。80年后,当年被营造学社探访过的古建筑,有的得到了较好保护,如遍布渠县的汉阙;有的则被开发性保护,化身旅游景点;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或被拆除他用,拆除殆尽,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当年的那些照片成了最后的定格。书后,萧易以20组照片进行了新旧对照,物还在,人已非,令人感慨甚多。



《漫长的调查:重走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调查之路》萧 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出版



▲图为营造学社在川康古建筑调查考察的第一座汉阙——高阙阙(摄于1939年)